

移工對接收國經濟暨社會安全影響之研究： 以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為例*

譚偉恩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跨國移工對接收國的影響為何已越來越受到經濟與安全研究者的重視。鑑此，本文聚焦在以下兩個問題：(1) 跨國移工是否對接收國的經濟成長具有裨益？(2) 跨國移工是否較容易犯罪或與接收國國民發生衝突，以致對當地社會秩序構成安全上的威脅？

透過對來自特定東南亞國家的移工進行觀察和分析，本研究發現跨國移工對於台灣的國家總體經濟具有正向裨益，同時並沒有明顯對我國的社會安全構成負面影響。然而，跨國移工帶來的正向經濟貢獻在實際效用上並非嘉惠於台灣全體，而是僅由特定群體享有。其次，個案研究顯示跨國移工相較於接收國台灣的國民，在犯罪率上反而比較低。值得吾人反省的是，台灣在官方政策上持續增加來自東南亞的跨國移工人數，作為填補產業勞動力缺口之方法，但一直欠缺配套措施去消除民間社會對於這個群體的歧視或偏見。

關鍵詞：台灣、東南亞、跨國移工、經濟發展、社會安全

* 作者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本文許多寶貴的專業建議，也同時對編輯委員會在本文最終題目名稱修改上的協助敬表謝忱。惟所有文責當由作者一人承擔。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Migrant Workers on Host Countries: A Case of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aiwan

Tan, Wei-En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laborers on host countries has been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studi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wo questions: (1) Are migrant workers beneficial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receiving countries? (2) Does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commit crimes or to threaten social order of receiving countrie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transnational laborers from certain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migrant workers are beneficial to the economy of Taiwan as a whole, and they apparently pose no threats to the social security in Taiwan. Nevertheles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conomic contribution made by migrant workers is not equally shared by all people but only certain groups. Further, the case study included in this paper shows, in comparison with people of Taiwan, migrant workers actu-

ally have lower crime rates. Ironically, the official policy in Taiwan is to continuous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foreign laborers from Southeast Asia as a way to fill the void of labor shortage, but there have not been complementary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discrimination or bias from most Taiwanese people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Taiwan, Southeast Asia, Migrant Work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ecurity

壹、前言

扣除個體自願性的偷渡及受迫性質的人口販運，跨國移工的現象和由此衍生之問題在當前國際關係的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 領域漸漸受到重視。¹ 這些非屬接收國 (host or receiving countries) 本國人的外籍工作者在合法入境接收國之後，² 對於接收國的經濟與社會秩序產生哪些影響，而這些影響是否涉及到當地人的安全利益，以致左右接收國政府或民間對跨國移工的政策、認知和互動？

不同的立場或觀察角度對於上述問題的理解可能略有差異；若是側重人權議題的學者，可能聚焦在跨國移工是否能獲得接收國法律上公平合理的對待，例如工時、休假、薪資、保險等問題；³

¹ 較早的文獻可參考：Myron Weiner, "Security,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93), pp. 91-126；近期的文獻則可見：Alexander Arifianto, "The Securit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Malaysia and Indonesia,"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1,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9), pp. 613-630; Layna Mosley and David Singer, "Migration,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8 (May 2015), pp. 283-301.

² 根據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較常於官方文件中使用之譯法，*host or receiving countries* 被翻成「地主國」或「輸入國」。惟本文認為此兩種譯法皆略有失其原意，且將移工自然人的屬性類比為貨品，並不適當。故參考國內其它類似或近似主題之研究論文，將 *host or receiving countries* 譯為「接收國」。例如：顧玉玲，〈跛腳的偽自由市場：檢析台灣外勞政策的三大矛盾〉，《台灣人權學刊》，第 2 卷 2 期（2013 年 12 月），頁 93-112。

³ Vincent Chetail,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s in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From Minimum Standards to Fundamental Rights,"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Vol. 28, No. 1 (2018), pp. 225-255.

如果是安全研究的學者，會比較在乎跨國移工有無可能威脅到接收國的國家安全，特別是對該國失業率的變化或社會治安上的衝擊；⁴而比較政治的學者傾向探索此種人口移動現象是從哪一種發展水平的國家移往哪一種發展水平，以及導致此種「移動」的推力與拉力究竟在相同發展水平的不同國家間有什麼區別。⁵為使本文的討論明確且聚焦，「跨國移工」之定義被適度限縮在以提供物理勞動力為主且非屬管理、研發或公共服務型的工作者，他／她們包括一般產業（例如：製造業、建築業）中的勞動者，但不包含看護或家事類型的服務提供者；⁶同時，在個人薪資多寡的因素外，這些移工所以會離開國籍本國前往接收國工作，是因為接收國本身的勞動市場出現明顯匱乏，故政策上採取主動開放或一些吸引移工之措施。

依據上述定義，目前台灣境內人口數最多的跨國移工是來自特定幾個東南亞國家（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而這些跨國移工中的絕大多數是技術性門檻較低的物理勞動力提供者，他

⁴ Fiona Adamson, "Crossing Bord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Summer 2006), pp. 165-199.

⁵ Margaret Peters, *Trading Barriers: Im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⁶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的定義，凡不具有接收國國籍，但於該國就業工作之人即為「移工」(migrant workers or labour migration)，目前全球共有 1 億 6400 萬左右的移工。詳見：ILO,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2nd Ed.* (Geneva: ILO, 2018)。另參照我國現行《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的規定，外國人在台灣境內從事工作的類型並不以低階技術門檻的勞工為限，而是包括教師等其它類型的工作。基於本文研究的主題，「跨國移工」所包含之勞動類型在定義上被適度限縮，合先敘明。

/ 她們在台灣過去近三十年的勞動市場裡人數不斷增長，⁷ 其原因部分和台灣勞動人口的老年化有關。⁸ 詳言之，台灣在過去三十年中，因本地勞動主力人口的年紀增長而逐漸退休或因體能狀況下降而離開職場，但年輕世代基於各種主觀或客觀因素不願投入物理勞動力的工作市場，導致台灣逐漸出現勞動力缺口，也就是所謂的缺工現象。⁹ 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其它國家引入勞工就成為填補我國勞動人口流失的一種方法，讓台灣的本土產業得以生存，國家經濟發展得以延續。然而，這些被引入的跨國移工對於作為接收國的台灣真的能提供經濟上實質的助益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麼台灣民間對於這群跨國移工還是存有一定程度的歧視？但如果引入移工並無法為台灣帶來經濟上的助益，為什麼政府對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移工在政策上持續開放和放鬆管制，導致台灣境內的跨國移工數量越來越多？以上這些因為移工現象而衍生出的問題均值得我們思索和釐清。

台灣係一個與國際社會頻繁接觸的國家，或許人民國際化的程度還有進步空間，但對於外國人、事、物的開放與接受程度並不算低。¹⁰ 以在台灣任教之外籍語言教師為例，姑不論在台工作

⁷ 彭政添，〈淺談統計數字中的東南亞移工現況〉，《移人》，2019 年 4 月 5 日，〈<https://mpark.news/2019/04/05/5738/>〉（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⁸ 〈消失的中流砥柱 台灣勞動市場正式進入中高齡化〉，《經濟日報》，2018 年 10 月 1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396661>〉（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⁹ 鄭國強，〈高齡、少子化 勞工每年短少 25 萬〉，《台灣醒報電子報》，2015 年 5 月 12 日，〈<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512-L54X>〉（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¹⁰ 傅仰止等人主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七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9 年），頁 280。

之合法性問題，一般台灣民眾對於這些外籍人士幾乎不存在歧視。¹¹ 這也就是說，在接收國境內的跨國移工與遭受接收國人民的歧視對待兩者間並不具有必然關聯性；毋寧，「外籍」與否並非是來台工作者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真正原因，工作的類型或象徵的社會階級恐怕更為關鍵。鑑此，本文以目前人口數最多，來自特定東南亞國家的跨國移工（依本文的定義）為觀察和分析對象，嘗試釐清是否此種類型的移工對於台灣的經濟發揮正向助益，或是侵害到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以及這些移工是否較容易犯罪，導致台灣社會秩序受到危害，因此引起國人的反感或歧視。

有關移工對接收國的影響為何是一個複雜但重要性很高的問題；對此，實證性與理論性的文獻頗為豐富，之中有兩個較常被提及的論點。一個是跨國移工對接收國勞動市場的衝擊，¹² 一個是跨國移工對接收國經濟成長的影響。¹³ 不過，這兩種紮實的經濟面向分析較少觸及跨國移工帶來的經濟影響與其對於接收國社

¹¹ 爛非渝，〈同工不同酬、非理性崇洋，台灣成為「弱勢西方人」的海外最佳「避風港」？〉，《換日線》，2018年1月3日，〈<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894&nid=9202>〉（2019年7月31日）。

¹² George Borjas,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4 (2003), pp. 1335-1374; Gianmarco Ottaviano and Giovanni Peri, "Rethinkin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0, No. 1 (February 2012), pp. 152-197.

¹³ A. Auerbach and P. Oreopoulos, "Analyzing the Fiscal Impact of U.S. Im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pp. 176-180; Jorgen Hansen and Magnus Lofstrom, "Immigrant Assimilation and Welfare Participation: Do Immigrants Assimilate into or out of Welfar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 38, No. 1 (Winter, 2003), pp. 74-98.

會安全的衝擊兩者間有什麼關聯，特別是當移工有助於接收國經濟發展的時候，為何接收國的人民還是對於移工存有一定程度的歧視或不友善，或是接收國在法律制度面還是不免將移工視為「次級群體」？本文希望在釐清跨國移工對台灣經濟影響究竟如何的同時，也能對過去較被研究文獻疏漏之社會安全面向提供一些解釋，作為研究上的貢獻。

除上述關於研究問題及其背景之相關說明，本文第貳部分將就跨國移工對接收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之影響進行文獻回顧。第參部分以在台灣之特定東南亞國家移工為例進行檢視，說明企業與政府為何傾向引入這些移工，而民間社會為何對這些移工存在或多或少的歧視或不友善。第肆部分的結論部分指出，來自特定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確實有正向助益，但因為這樣的好處高度集中在某些特定群體，像是企業型的僱用者，同時大量移工在融入台灣社會過程中的「成本」沒有適當地被分配，導致許多台灣民眾對於跨國移工產生負面認知與印象。

貳、文獻回顧

一、移工對接收國經濟面向之影響

移工對於接收國經濟層面的影響究竟為何在學界一直處於辯論狀態，因為從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變化來看，移工帶來的負面衝擊並不明顯，甚至在某些國家還帶來 GDP 增長的效果。然而，若從人均 GDP (GDP per capita) 的變化來看，移工造成的經濟影響就隨著不同的接收國和其境內不同的觀察群體而有所差異。N. Gregory Mankiw 等人

的研究將儲蓄率與人口成長率（包含移工人數的增減）列入考量，並同時把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與實體資本 (physical capital) 的累積效應納入分析，發現移工人數的增加有助於一國的人力資本累積，但卻同時減損了該國的實體資本累積。不過，若把觀察的期間拉長，兩種類型的資本累積都是增加的。有趣的是，在人均 GDP 部分，明顯受到人口成長率的影響，通常人口成長率較高的國家，人均 GDP 較低，並且在勞工階級最明顯。¹⁴ John Bauer 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認為人口成長對於勞工階級的人均所得具有顯著之負影響。¹⁵

有別於上述觀點，Juan Dolado 等人的研究認為，實體資本弱化（特別是勞工所得下降）的問題會透過移工對於接收國人力資本的累積而獲得補償。¹⁶ 換句話說，移工對於接收國經濟的正面助益主要是展現在人力資本累積的部分，而非人力與實體兩種資本類型均同時全面性增加。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已開發國家都受惠於外來移工所累積的人力資本，並且這樣的效果大於移工所造成的實體資本弱化現象。簡言之，如果只看到人均 GDP 數字上的下滑和伴隨而來的消費能力衰退，會認為移工不利於接收國的

¹⁴ N. Gregory Mankiw, David Romer, and David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1992), pp. 407-437. 請讀者留意，此處的「人口成長率」不單是接收國本國人口數的提升，也包括接收國境內跨國移工的人口數目。

¹⁵ John Bauer,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in East Asia," in Andrew Mason, eds.,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2.

¹⁶ Juan Dolado, Alessandra Goria, and Andrea Ichino, "Im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the Host Country: Evidence from Pooled Country Dat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7 (1994), pp. 193-215.

經濟；但若同時將數字化的實體資本與勞動力優化後的人力資本一併觀察，移工對於接收國的經濟發展是有正向助益的（當然助益程度會依國家不同而有高低之別）。¹⁷

不過，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什麼類型的跨國移工對於接收國的經濟成長有正向助益？畢竟很多時候新聞媒體呈現的訊息是，移工在與接收國本地勞工競爭工作機會，甚至搶走了他／她們的飯碗。¹⁸ 根據文獻，對接收國經濟有助益的移工是那些能補足接收國需求之移工。¹⁹ 但這樣的說法並不明確，因為每個接收國的「需求」不盡相同，況且也不是每個接收國都有條件吸引到自己真正所需要的移工類型。為使本文的討論聚焦，研究上以前言所定義之物理勞動力型移工為觀察對象；因為此種類型的移工通常對接收國的人力資本累積有確切幫助。既有的研究文獻也的確證實當把勞動力型的移工置於 Solow-Swan 模型中檢視，²⁰

¹⁷ 較早期的文獻可見：D. Benjamin and M. Baker, *The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in the Canadian Labor Market* (Mime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2); 近期的文獻見可參考：Isaac Ehrlich and Jinyoung Kim, “Immigrati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Human Capital*, Vol. 9, No. 4 (Winter 2015), pp. 518-563.

¹⁸ 蔡青龍、林季平，《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工作異動之影響分析》（台北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0 年）；薛承泰、林昭禎，〈外勞數量與台灣勞工就業的關係〉，《國家政策論壇》，2004 年，春季號，〈<http://old.npf.org.tw/monthly/0401/theme-212.htm>〉（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¹⁹ Giovanni Peri, “Immigrants, Productivity, and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0, No. 4 (Fall 2016), pp. 3-29.

²⁰ 自從 Solow 提出國家經濟成長的模型後，許多實證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在經濟成長與否中扮演關鍵角色，遺漏人力資本的觀察會低估一個國家實際的經濟成長結果。Kendrick 針對人力資本進行研究，發現美國資本存量中有一半以上是人力資本。此後，不少學者的研究也皆證實人力資本的精準估算有助於確切掌握一國經濟成長的路徑 (economic growth

會發現移工對於接收國人力資本累積上的貢獻填補了（至少是部分）實體資本弱化所帶來之負效果。²¹ 不過，應予注意的是，並非只有勞動力型的移工才會對接收國經濟產生正向裨益，Lucas Bretschger 的研究便指出，接收國的研發成本將透過引進具一定「技術」的跨國移工而獲得減少，因此能為接收國帶來經濟成長。²² 依循這樣的說法，Giovanni Peri 認為，移工帶來的經濟影響究竟為何需要透過對移工所具有的「技術」質量進行分析才能真正加以確定。詳言之，勞動力型的跨國移工和接收國本地的勞工之間究竟是互補性還是競爭性，取決於接收國係基於什麼樣的需求來引入移工。有些國家需要的是高技術或專業性移工（例如美國矽谷區的工程師），而有些國家需要的是低階技術或基礎勞動力的移工，這兩種不同的需求左右了移工的均衡效果 (the

path)。基於這樣的理解，本文假定 (assume) 移工初到接收國時並不具有實體資本的貢獻，但因其具有技術並願意提供勞動力，故對接收國具有人力資本上的貢獻。倘若接收國本身的條件（例如：工資）具有吸引力，則移工人數會持續增加，因此人力資本也會隨之不斷累積。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移工人數增加是稀釋接收國的實體資本，但其帶來的人力資本有可能超過所稀釋的實體資本。類似觀點與相關研究可見：Robert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No. 1 (February, 1956), pp. 65-94; Gerhard Glomm and B. Ravikumar, "Public Versus Privat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Endogenous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No. 4 (August, 1992), pp. 818-834; John Kendrick, "Tot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tlantic Economic Review*, Vol. 69 (1994), pp. 396-410; 陳俊育, 《經濟成長與人口遷移：美國個案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²¹ Solow, *ibid.*; Dolado, Goría, and Ichino, *supra* note 15.

²² Lucas Bretschger, "Labor Supply, Migration,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pen Economies Review*, Vol. 12, No. 1 (January 2001), pp. 5-27.

equilibrium effects)。²³ 事實上，Florence Jaumotte 等幾位學者在他們的研究中進一步確認跨國移工的「技術」與接收國經濟成長之間具有關聯性，並證實勞動力型的移工有助於接收國經濟發展。同時，他們也認為，以長期的經濟發展來看，無論是高階還是低階移工均對接收國有正向裨益，並具還會增加人均所得與生活水準。²⁴

在針對特定國家的移工研究方面，George Borjas 以美國的移工資料為據進行估算，也得出類似結論；即勞動市場上的跨國移工為美國經濟帶來正向助益。不過，他在結論中特別強調，此種正向助益是從總體經濟的成果來看，而不是從美國一般人民的角度來看。²⁵ 由此可知，就算我們確定勞動力型的跨國移工是對接收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有利，但對於就業市場上的個人而言，的確可能會出現跨國移工排擠接收國本地勞工之現象，或是導致工資下降的結果，而此種情況特別容易發生在技術質量相仿的跨國移

²³ Giovanni Peri, “Immigrants, Productivity, and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30, No. 4 (Fall 2016), pp. 3-30.

²⁴ Florence Jaumotte, Ksenia Koloskova and Sweta Chaman Saxena, “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come Levels in Advanced Economies,” *Spillover Notes*, No. 16/08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illover-Notes/Issues/2016/12/31/Impact-of-Migration-on-Income-Levels-in-Advanced-Economies-44343>> (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有趣的是，這份研究文獻強調，擁有高階技術的移工會帶來多元的知識與豐富的實務經驗，而低階技術的移工會填補接收國基礎產業的勞動力缺口。而這樣的情況似乎在某程度上與台灣目前的情況相似。

²⁵ George Borjas, “Immigration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2013), <<https://sites.hks.harvard.edu/fs/gborjas/publications/popular/CIS2013.pdf>> (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工與接收國勞工之間。²⁶ 同時，這種結果的背後經常為人所忽略的是，雇用這些跨國移工的業者在利潤上有所增加或是人事費用的成本降低。²⁷ 然而，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的報告強調，當觀察跨國移工的期間超過十年或甚至更久時，移工對於接收國本地勞工薪資的衝擊將是微乎其微的。²⁸ 而且在某程度上，負面效果的發生是侷限於學歷較低的本地勞工，而非所有接收國的本地勞工。此外，若移工本身是具有專業技能者，會刺激接收國本地的同類型工作者設法升級，以避免在職場競爭中被市場邊緣化，所以長期下來接收國的勞動素質還會因此有所提升；同時，那些專業技能優異的本地勞工在就業市場上會受到更好的薪資待遇。²⁹

經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來自外國的勞動力型移工對於接收國的經濟發展是有利的，特別是一旦觀察期拉長，移工正向助益

²⁶ Anthony Edo,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Vol. 33, No. 3 (July 2019): 922-948.

²⁷ Gianmarco Ottaviano and Giovanni Peri, "Rethinkin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0, No. 1 (February 2012), pp. 152-197. 此種情形和台灣所面臨的情況似乎頗為吻合。

²⁸ CI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tudy of Immigration: Workers and Taxpayers Lose, Businesses Benefit,"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September 21, 2016, <<https://cis.org/Press-Release/National-Academy-Sciences-Study-Immigration-Workers-and-Taxpayers-Lose-Businesses>> (2019年7月31日查詢)。

²⁹ *Ibid.* and Raquel Carrasco, Juan Jimeno, and A. Carolina Orte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of Native-born Workers: Some Evidence for Spai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1, No. 3 (July 2008), pp. 627-648.

接收國經濟的效果會更為明確。比較值得留心的是，在個人層次方面，移工確實會對接收國本地的某些群體造成負面衝擊，而這樣的衝擊輕則反映在薪資所得的下滑，重則是導致本地教育程度較低或是技術質量較差的勞工群體面臨就業機會的競爭而失去工作。儘管如此，跨國移工並非對所有接收國的本地勞工都構成威脅。此外，如果同樣也把觀察期限拉長，移工對於接收國的整體勞動素質會產生拉抬的效果。

二、移工對接收國社會秩序面向之影響

本文將社會秩序面向的影響集中在兩個部分進行討論；一是跨國移工在接收國犯罪的機率，一是跨國移工和接收國國民發生衝突之原因。做此區分的理由是因為以台灣現行法律制度的設計，跨國移工很難取得具有參與政治活動之公民資格，因此對台灣的選情、選舉結果，乃至於政治發展不會有主動性及直接性的影響。其次，現行台灣的法律制度也很難讓移工透過考試服公職，故而對台灣的行政制度和公務體系也不會產生主動性與直接性的影響。有鑑於此，觀察移工對接收國社會秩序面向之影響宜從這個群體得以作為「權利主體」的身分切入，而日常生活中跨國移工與另一權利主體（接收國的國民）的衝突，或是對另一權利主體的法益侵害，將是比較適合且貼近移工真實生活的觀察與分析視角。

在涉及社會秩序的文獻中，不乏有論者討論跨國移工（部分會以移民進行更廣泛的觀察）與接收國國民何者的犯罪率較高，³⁰ 而當移工的觀察範圍被限縮在物理勞動力型的工作者時，

³⁰ 邏輯上，移民不一定需要在接收國有一份工作，單純的依親只要在入境、

社經地位的相對劣勢，讓她／他們容易感到不平等、剝奪感或被歧視，而成為容易犯罪的群體。³¹ 不過，有研究指出任何社會階級的人都有犯罪的動機與誘因，白領犯罪對社會安全的危害甚至可能更大。³² 此外，個人社經地位跟犯罪之間的關聯性雖然有一定程度之關聯，但無法忠實反映出行為人所犯罪之類型、犯案地點，以及一個國家警政司法系統의 犯罪偵察率等其它中介變量 (intervening variables) 的影響。³³ 詳言之，接收國的人民未必較跨

身分與居留等程序面合法，即是所謂的移民。移工雖然是實際生活在接收國的人，但其入境的合法文件是工作簽證，而非移民簽證，因此資格上僅是合法居留於接收國的「工作者」，而不是接收國的國民，一旦居留期限屆至，依接收國法律必須離開。準此，已合法取得身分之移民如果同時在接收國有工作（特別是物理勞動力型的工作），應視為接收國本地的勞工，而不是本文所指的跨國移工。國內外許多討論移民或移工犯罪的文獻並沒有嚴謹區分兩者。

³¹ 此處的「犯罪」現象是透過與接收國公民比較而來，並非先驗性的認為跨國移工就是容易犯罪的群體；此外，犯罪率的比較也沒有精細地考慮犯罪態樣與嚴重程度的差異，因此微罪數量很多會呈現犯罪率高的結果，但微罪對社會秩序的衝擊與妨礙小於數量較少但惡性重大的犯罪。相關文獻可參考：David Card, "Is the New Immigration Really so Bad?" *Economic Journal*, Vol. 115, No. 507 (November 2005), pp. F300-F323; James Lynch and Rita Simon,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Criminal Involvement among Immigrants and Natives across Seven Nations," in Graeme Newman and Joshua Freilich, eds., *Crime and Immigration*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pp. 273-290.

³² 周懷嫻，〈白領犯罪的界定與爭議〉，《犯罪學期刊》，第9期（2002年6月），頁1-32；John Braithwaite, "Poverty, Power, and White-collar Crime," in K. Schlegel and D. Weisburd, eds., *White-Collar Crime Reconsidered*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8-107.

³³ Paolo Buonanno and Daniel Montolio, "Identifying the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Crime across Spanish Provinc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8, No. 2 (2008), pp. 89-97.

國移工來得守法或較不容易犯罪；同時，接收國所偵察到或進行司法審判的移工犯罪不一定全然與其本國人無關，以妨礙風化類的犯罪為例，在台灣有不少性服務的外籍工作者其雇主或老闆是台灣人。事實上，有文獻指出，非物理勞動力型的跨國工作者所犯的罪往往不是鬥毆、傷害或竊盜一類的普通刑事犯罪，而是屬於販製毒品或金融詐欺一類較需長時間偵查且不易被司法警調機關發現的犯罪。³⁴ 另一方面，社會學、人類學或是具有跨領域性質的移工研究文獻發現，移工與犯罪的問題經常是在濃厚主觀意識的前提下被討論或處理。以美國這樣一個境內有大量移工及移民人口的國家為例，來自拉丁美洲的移工犯罪率在統計上比其它地區的移工要高，但這樣的情況其實與不同地區在美國的移工人口總數有關，同時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前後並沒有在結構上發生明顯變化。可是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多數群眾卻形成一種主觀偏見，認為境內移工的犯罪與中東國家的穆斯林 (Muslim) 人口有關，但事實上信仰伊斯蘭 (Islam) 的跨國移工（無論是否來自中東地區）在美國是犯罪率最低的外來群體。³⁵

由上述文獻可知，移工與犯罪或移工對於接收國社會秩序的影響在討論上還需要更為嚴謹的觀察與深入研究。此外，不同

³⁴ 同時這樣的犯罪已多半不是個別白領工作者的犯罪，而是以「公司」或是「企業—政府」聯手的組織犯罪型態在進行。詳見：Ronald Berger, *White-Collar Crime: The Abuse of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Power*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11), p. 2 and Ch. 6.

³⁵ Neeraj Kaushal, Robert Kaestner, and Cordelia Reimers,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September 11th on Arab and Muslim 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 42, No. 2 (Spring, 2007), pp. 275-308.

國家或雖為同一國但區域有別時，情況也未盡相同，目前的研究成果還不足以讓吾人去進行通則化推論。簡言之，跨國移工與接收國社會秩序間的關係為何，尚待更多研究心力的投入來確立其確切的因果關聯性。此外，移工本身是一個頗大且構成員複雜之群體，內部往往又可因來源國或宗教信仰的差異再進行細緻的分類，所以有學者指出，儘管在美國是來自拉丁美洲國家的移工人數最多與犯罪率最高，但因為在文化與宗教信仰上這些移工與美國人民較相似，所以他 / 她在日常生活中和美國人的衝突反而較少。相較之下，華人、越南人、印度人，以及穆斯林的移工人口雖然在數量上遜於來自拉丁美洲的移工，且犯罪率明顯較低，但在日常生活上因為與美國人的文化或宗教信仰差異較大，反而導致不少衝突。³⁶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移工與接收國國民如果發生衝突，未必一定涉及某種犯罪，就像在台灣有許多跨國移工假日會聚焦於台北車站的大廳，這種行為並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但卻在某程度上造成台灣民眾的不便，也曾經因此導致彼此有一些爭執或磨擦。同時，若干文獻也提醒我們，移工與接收國國民發

³⁶ 相關文獻請見：Nancy Foner and Richard Alba, “Immigrant Religion in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Bridge or Barrier to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2, No. 2 (Summer 2008), pp. 360-392; Richard Alba, “Bright vs. Blurred Boundaries: Second-Generation Assimilation and Exclusion 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8, No. 1 (2005), pp. 20-49; Stephen Cornell and Douglas Hartmann, “Conceptual Confusions and Divides: Race, Ethnicity, and the Study of Immigration,” in Nancy Foner and George Fredrickson, eds., *Not Just Black and Whit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4), pp. 23-40.

生衝突時未必一定就是移工有錯在先，或是欠缺合理的基礎。³⁷ 毋寧，如果衝突事件的發生是接收國國民有錯在先或是有所理虧時，我們在進行問責與非難時亦應公允地將這些情況納入考量，而不是僅僅追究跨國移工行為的是非。

總的來說，開放或引入移工入境一定會對接收國的社會秩序及安全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但此種影響究竟能不能簡約成跨國移工的犯罪率比較高，或是易與接收國本地人產生衝突，應該說清楚和講明白。如同前述文獻回顧提及的，並非所有跨國移工都容易和接收國國民發生衝突，而是在宗教信仰或生活習慣上差異較大的移工群體才會比較容易。同時，衝突的發生不見得就意謂著有犯罪行為，就算有時犯罪會與衝突相伴而生，移工也未必就是滋事者或所有法律責任之承擔者。至於那些對接收國社會治安衝擊較大的刑事犯罪，目前的研究文獻還沒有辦法確認移工一定比接收國的國民更容易從事此類型的犯罪，而是只能說明移工在社經地位上的相對劣勢與其所犯罪之類型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事實上，本文透過文獻回顧後的理解是，如果以人口比例的角度來思考犯罪率的問題，恐怕難以得出跨國移工比接收國國民更傾向違法之結論。所以，跨國移工對於接收國的社會安全不必然一定會構成負面影響；文獻上甚至有一些學者發現，人口結構中族群較為多元的社會，犯罪率反而較低，³⁸ 因為對於這些非接

³⁷ 林佳和，〈高雄捷運泰勞暴動事件〉，《月旦法學雜誌》，第 126 期（2005 年 11 月），頁 187-196；張翰壁、張晉芬，〈全球化效果的侷限：臺灣民眾對接納跨國移民的態度〉，《臺灣社會學刊》，第 52 卷（2013 年），頁 131-167。

³⁸ 近期的研究如：Sefa Churchill and Emmanuel Laryea, “Crime and Ethnic Diversity: Cross-Country Evidence,” *Crime & Delinquency*, Vol. 65, No. 2

收國本本國人的移工來說，她／他們只是去「求財」，行事低調和不惹麻煩才是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選擇，才能讓她／他們盡可能在接收國長留，賺取較自己國籍本國為高的薪資。³⁹

參、個案研究：在台灣之特定東南亞國家移工

作為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種現象，跨國移工在許多國家都呈現人數漸增之趨勢，無論已開發還是發展中國家皆然。舉例來說，像美國這樣的已開發工業先進國家除了是一個人所皆知的老牌移民國家外，其境內的跨國移工人口數也佔全美勞動總人口相當一部分的比例，大約是 2820 萬人左右。⁴⁰ 不過，像香港這樣一個面積狹小又不是主權國家的實體 (entity)，卻也同樣擁有大量的移工人口。自 1970 年代開始引進跨國移工後，來自菲律賓、印尼及

(February 2019), pp. 239-269; 早期的經典研究則是：Judith Blau and Peter Blau, "The Cost of Inequality: Metropolitan Structure and Violent Cr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7, No. 1 (February 1982), pp. 114-129。這兩篇文獻均指出，人口結構的多元並不是導致一個社會犯罪率高或是衝突頻繁的原因，真正的關鍵是不同次群體彼此間的不平等。而國內文獻也有持類似觀點者，例如：張碧珠，《外國人在臺犯罪預測及防制之研究》（桃園龜山：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蔡田木，〈外籍人士在臺犯罪狀況及其在監生活之分析〉，《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第 9 期（2008 年），頁 165-191。

³⁹ Michael Tonry, *Ethnicity, Crime, and Immigration: Comparative and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Daniel Mears, "Immigration and Crime: What's the Connection?" *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 Vol. 14, No. 5 (March/April 2002), pp. 284-288。

⁴⁰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Labor Forc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born Workers Summary*, available on: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forbrn.nr0.htm/labor-force-characteristics-of-foreign-born-workers-summary>> (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泰國等東南亞的移工在香港境內的人數呈現穩定成長，尤其菲律賓籍的跨國移工（多為家事服務類型）在香港已形成一支龐大的社群。⁴¹

相較之下，台灣雖然工業技術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像美國，而經貿自由度也不若香港，但對開放和引入跨國移工的相關政策在官方立場上是逐漸放鬆管制，特別是對來自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型移工。這個趨勢一方面讓台灣境內的跨國移工人數和美國及香港一樣不斷增加，⁴² 一方面讓台灣境內族群的多樣性變得豐富。不過，隨著移工人數漸漸攀升，來自不同國家的移工彼此之

⁴¹ Maren Boersma,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Between Permanence and Temporariness in Everyday Life," *Current Sociology*, Vol. 67, No. 2 (March 2019), pp. 273-293.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香港雖然並非主權國家，但對於外籍移民與跨國移工的相關政策近年來浮現越來越多的辯論。早期的移民相關法律透明度比較高，給予移工的薪資很優渥；但治權回歸在北京的中共政權之後，限縮性（或甚至帶有歧視性）的移民政策，以及來自民間社會對移工的反彈聲量開始漸漸高漲。請參考：Johannes Chan, "The Evolution of Immigration Law and Policies: 1842-2003 and Beyond," in Johannes Chan and Bart Rwezaura, eds., *Immigration Law in Hong Kong: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Hong Kong: Sweet & Maxwell Asia, 2004); Kevin Hewison,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4, No. 3 (2004), pp. 318-335; Helen Siu, Richard Wong, and David Faure, *Rethinking Hong Kong's Human Resources and Competitiveness: A Pre-Policy Stud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⁴² 台灣境內的東南亞國家移工人數是一直持續增長的，自 2001 年的 30 萬左右攀升到 2018 年的 70 萬左右。其中，產業外勞（本文指涉的勞動力型）約佔 45 萬，越南籍移工最多，其次則是菲律賓籍和泰國籍，印尼籍移工雖然在台灣總人數最多，但多半是從事家庭看護工。詳見：勞動部統計處，〈外籍工作者相關統計資料〉，〈<https://statdb.mol.gov.tw/html/mon/i0120020620.htm>〉（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間以及移工與台灣人民之間的融合與相處也開始成為一個棘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因為過程中不斷出現磨合與動盪。⁴³ 儘管台灣民眾平均而言對全球化與國際貿易的接受度頗高，並且也知道對外開放與台灣本身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⁴⁴ 但對於開放服務類型的貿易，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架構下《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 中的自然人移動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第四種服務類型)，民間的意見就變得相當分歧，甚至不乏存在保守的聲音。⁴⁵ 事實上，社會大眾傾向認為政府應對東南亞移工進行限制或至少應加強管制。

本部分將依序分析引進跨國移工對於台灣的經濟層面和社會秩序層面的影響；分析的重點在經濟上，是分析移工對於企業和

⁴³ 江豐富，〈外勞引進對本國勞工失業、職業選擇及薪資的影響〉，《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 37 期 1 卷 (2006 年)，頁 69-111；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主持人：李宜)，〈國際人口移動對我國勞動市場及經社發展之影響與因應對策〉 (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2009 年 11 月) 頁 85-130。

⁴⁴ 詳見：傅仰止等人主編，前引註 9。

⁴⁵ 李健鴻，〈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自然人移動」的勞動市場調控機制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9 卷 2 期 (2017 年 6 月)，頁 284-285。原則上，GATS 中的自然人移動限於暫時性的工作人員，即 WTO 會員之服務業者在其他會員境內以「個人」身份提供服務，常見者如：律師、醫師、建築師或其它專業領域。自然人移動在 GATS 屬於第四模式，其具體內容能不能擴大到「勞工」目前仍在談判階段，爭議的重點是如果把藍領勞工納入，它對於開放移工入境的國家 (或關稅領域) 會構成什麼影響。詳見：Marieke Koekoek,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GATS Mode 4 Negotiations of the Movement of Low Skilled Workers,"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February, 2014, <https://ghum.kuleuven.be/ggs/publications/working_papers/2014/131koekoek> (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個人之影響進行判斷。而在社會秩序部分，則是對移工在台灣的犯罪情況和與台灣本地人民互動過程中的磨擦進行討論。

一、跨國移工對台灣的經濟影響

台灣的跨國移工政策始於 1989 年，但在正式由政府引入之前，已有部分外籍人士透過非官方的管道來台就業。對於跨國移工的開放，主要與台灣的經濟成長受限有關，而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就是國內勞動力出現短缺，還有自 1990 年以來的勞工薪資調整問題。⁴⁶ 這些背景一步步讓產業界和政府相互攜手，推動台灣將引進移工的門戶打開，使得本國勞動市場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跨國移工。不過，這些來自其它國家的移工普遍具有兩項特徵，一是絕多數來自東南亞地區，一是普遍欠缺中階或高階專業技術，而是以提供物理勞動力的低階技術為主。⁴⁷

根據台灣勞動部的相關統計數據，在我國的移工人口總數於 2018 年年底已達 706,850 人，其中本文所定義的跨國移工大約有 45 萬人，佔我國移工人口的六成以上，主要來自（依序）越南、

⁴⁶ 我國行政院自 1989 年正式開放外籍工作者來台，當時的主要考量是勞動市場之人力需求與特定勞力不足之國內產業，實施上以「限業限量」搭配「專案方式」引進專業技術門檻較低之外籍移工。詳見：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主持人：林國榮），《未來十年我國外勞政策變革方向之研究》（談本：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2014 年 4 月），頁 16。

⁴⁷ 楊婉瑩、張雅雯，〈為什麼反對移工/移民？—利益衝突抑或文化排斥〉，《政治科學論叢》，第 60 期（2014 年 6 月），頁 49；Ching-Lung Tsay and Ji-Ping Lin, “Labor Importation and Unemployment of Local Workers in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10, No. 3/4 (2001), pp. 505-534.

菲律賓、泰國。⁴⁸ 由於來自這些特定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型移工已在台灣整體人口結構中佔有一定比例，而且對於台灣的經濟活動具有一定貢獻（特別是新北、桃園、台中等地區），所以台灣境內跨國移工的相關問題顯然已不容忽視，而目前政府的官方政策也將這樣的跨國移工群體與「新南向政策」結合，使其具有或多或少的外交屬性。⁴⁹

從經濟層面來看，依據本文蒐集到的相關資料，跨國移工的引入對於台灣經濟的成長扮演關鍵之驅動者角色。文獻甚至曾指出，台灣從開放跨國移工進入勞動市場後到 2013 年為止，不少國內企業仍然存在缺工問題，同時基層勞動力的欠缺使得我國至少到 2025 年都還需要引進相當數量的外籍勞動工作者。⁵⁰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研究院最新公佈的問卷資料中，有 30.4% 的受訪民眾認為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數應該減少「一些」，有 15.6% 認為應該「大幅減少」。⁵¹ 顯然，企業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及缺工

⁴⁸ 以具體的移工國籍來看，在台灣跨國移工在 2000 年以前多數來自印尼、泰國、菲律賓，而從 2001 年開始，越南籍移工人數漸漸增加（無論男女）。以具體的產業別來看，泰國的勞動力型移工人數明顯減少，但越南與菲律賓的人數則相對在增加，主要集中在所謂的 3K 產業（辛苦、污穢、危險）。此外，家事與看護類型的移工主要是來自印尼，多半在台灣從事居家型的家政事務或是長照性的看護工作（但此種類型的跨國移工不在本文討論範疇）。

⁴⁹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新南向政策參考資料〉，2016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Content/upload/editor/otherfiles/1061011_新南向政策參考資料.pdf〉（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⁵⁰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未來十年我國外勞政策變革方向之研究》，前引註 46，頁 III。

⁵¹ 詳見：傅仰止等人主編，前引註 9，頁 278。

的憂慮和一般民眾對於引入外籍工作者的消極或排斥立場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對此，楊婉瑩和張雅雯的研究明確指出，2007 年以後，跨國移工在就業市場上漸漸開始與台灣本地勞工呈現競爭關係，同時隨著移工人數的增加，企業（或資方）在勞資關係中的議價能力獲得提升。簡言之，台灣的企業生產力和國家總體經濟因為移工的引入而受益。⁵² 不過，應予強調的是，很多東南亞移工每天工時長達 10 小時以上，但所得之薪資低於台灣本地勞工，⁵³ 且聘顧者毋需承擔 6% 的勞退金和三節獎金等人事成本。此外，移工的工作地點或是工作環境通常比較惡劣或是具有一定程序的風險，像是髒亂、通風不佳、過熱或過潮等，這些劣質的工作條件是導致台灣本地勞工欠缺意願投入職場的主因之一。然而，來自特定東南亞國家的移工適時填補了這塊台灣目前面臨的勞動力缺口，讓許多仰賴物理勞動力型的產業（特別是製造業）得以維持或延續一定之生產力。另外，在一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致理技術學院執行的調查報告中指出，跨國移工對台灣企業在投資與研發上的助益雖然不大，但確實對企業利潤的增加和勞動人事成本的降低帶來顯著影響。⁵⁴ 對政府而言，開

⁵² 楊婉瑩、張雅雯，前引註 47，頁 50。

⁵³ 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家事類型的外籍移工每個月在台灣薪資是美金 530 元上下，而在工廠生產線的勞工大約是 638 美元。兩種類型的移工薪資均較台灣平均工資低。詳見：Ralph Jennings, "Southeast Asian Migrants Revitalizing Taiwan Economy," *VOA News*, April 29, 2013, <<https://www.voanews.com/a/southeast-asian-migrants-revitalizing-taiwan-economy/1650818.html>> (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⁵⁴ 致理技術學院，《建立外籍勞工引進對國內整體經濟與社會效益之制度化評估》（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12 年 8 月），頁 83-85、116-120。

放或是放寬跨國移工來台的法規，可以發揮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和抑制產業外移的間接效果，這對穩定國家經濟有不小的幫助。⁵⁵

根據筆者請益移民署和調查局官員的簡易訪談資料來看，他／她們在執勤過程中較常看到泰國籍的勞動力型移工在民間的工廠或工地裡從事極耗體力之工作，致於其它國籍的移工有在雲嘉南偏鄉從事農業的，有在基宜港口從事漁業的、也有在桃竹苗等地從事建築或加工相關事務的。歸納這些跨國移工投入之勞動市場，可以發現幾個共同點，即人身安全的風險較高、大量且密集的勞力輸出，台灣社會通念中的低階工作；但這些工作卻是維繫台灣民間日常經濟生活和中小傳產不可或缺之一部分。因此，跨國移工對於我「國」的經濟是有具體貢獻的。不過，有文獻特別指出，雖然引進低技術門檻的移工對我國本地勞工失業之衝擊影響有限，但對台灣實質國民的生產毛額則沒有提升之效果。⁵⁶ 這也就是說，跨國移工的引入雖然有助於國家的經濟，但對「個體國民」的經濟則未必同樣有所裨益。此外，因為跨國移工人數逐年增加，但近幾年國人失業率的問題沒有明顯改善，尤其在基層勞動市場部分，2009年還曾經突破7%的失業率，⁵⁷ 不免易讓國人產生一種認知，即跨國移工的引進是導致台灣本地勞工失業的原因。然而，根據辛炳隆的研究，國人在應徵基層勞動工作時常

⁵⁵ 李誠，〈外勞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羅紀琮（編），《台灣外籍勞工研究》（台北：中央經濟研究院，2007年），頁9-43。

⁵⁶ 陳坤銘，〈引進外籍勞工對台灣經濟影響之再分析〉，《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15卷1期（2007年6月），頁1-26。

⁵⁷ 〈藍領失業率破7% 貧富差距擴大〉，《自由時報》，2009年12月26日，〈<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12431>〉（2019年7月31日查詢）。

因薪資不如預期或是工作地點不理想，而放棄就職。⁵⁸ 這也就是說，移工所構成的就業競爭壓力並非台灣本地勞工失業的主因。事實上，根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統計和分析資料，可以發現在低階技術勞工失業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市裡，跨國移工佔該縣市勞動人口的比率並不高。⁵⁹ 這樣的資訊更加提醒我們不應先入為主地產生跨國移工會排擠台灣本地勞工的迷思。

二、跨國移工對台灣的社會秩序影響

儘管跨國移工的引入為台灣填補了勞動力不足之缺口，且對台灣國家總體經濟具有一定貢獻，但官方政策上一直是以短期、暫時、補充性的人口來定位這個群體。⁶⁰ 他/她們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存在被極度化約為是功能性的經濟考量，幾乎完全被排除成為台灣人的可能。正因為如此，台灣民眾或許已不排斥和特定東南亞國家來台的移工共事或成為生活上的鄰居，⁶¹ 但認知上仍有很高的比例認為東南亞來的移工在社經地位上低於台灣人。這樣的認知又進一步衍生出國人對於這群移工在權利待遇上的歧視，也就是除非移工在稅賦上有貢獻並且能擁有身分證之後，才可以和一般台灣人享受同等的法律上權利。⁶²

⁵⁸ 辛炳隆，《主要經貿國家產業競爭研究及政策規劃計畫：勞工法令及相關政策變革對我國產業的影響與因應》（台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研究計畫，2011 年）。

⁵⁹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外勞引進政策對國人就業之衝擊評估研究》（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4 年 3 月）。

⁶⁰ 楊婉瑩、張雅雯，前引註 47，頁 52。

⁶¹ 詳見：傅仰止等人主編，前引註 9，頁 272、275、295。

⁶² 同上註，頁 297。

人類認知中歧視形成的原因十分複雜，但對移工接收國的人民而言，一個很重要的歧視來源在於隨著政府開放入境的跨國移工人數越來越多，而漸漸認為移工將對社會秩序構成安全上的威脅。⁶³ Herbert Blumer 早在 1958 年就提出偏見理論 (theory of prejudice) 闡述這樣的現象，指出對於特定群體的仇視或敵意多半肇因既得利益的優勢群體在感到自己安全的生存空間受到威脅後所做出之回應。⁶⁴ 提及安全，跨國移工是否對接收國的社會秩序構成負面衝擊是一項很重要的研究課題。觀之勞動部公開之統計數據（從 2009 年到 2018 年），所有來台工作的特定東南亞移工（包括不在本文定義中的跨國移工）犯罪人數有逐年成長的情況，從十年前的 311 人攀升到去年的 2,406 人。其中越南與泰國籍移工的犯罪成長率高於印尼和菲律賓，而所犯之罪的態樣以公共危險及毒品兩類為大宗（佔所有犯罪的 50% 以上）。⁶⁵ 然而，上述這些資訊不足以得出東南亞移工危害台灣社會秩序的結論，理由在於：(1) 移工犯罪總人數的增加與移工來台總人數的增加有關，

⁶³ Layna Mosley and David Singer, "Migration,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8, No. 1 (May 2015), pp. 283-301. 類似的情形其實在許多國家都發生過或正在發生，甚至有學者指出，國家在全球化時代可以大幅開放本國貨品市場給外國商品，但對於開放移工入境反而有越來越保守的趨勢。詳見：Nazli Choucri, "Migration and Security: Some Key Linka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6, No. 1 (Fall 2002, pp. 97-122; Peters, *Trading Barriers*, supra note 4, pp. 1-3.

⁶⁴ Herbert Blumer, "Race Prejudice as a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 No. 1(Spring 1958), pp. 3-7.

⁶⁵ 勞動部統計查詢網，〈<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100&kind=10&type=1&funid=q13021&rdm=o7fKZKio>〉（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若改以比率換算呈現，而非單就犯罪人數的變化加以觀察，情況可能會有不同。此外，如限縮移工類型在本文所指的物理勞動力型的移工時，則無論是單純的犯罪人數或犯罪人數佔來台移工總人數之比率，均會下降；(2)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國情統計通報」，公共危險類的犯罪主要是酒駕，⁶⁶ 而台灣本國人民酒駕的頻率和肇事率明顯高於移工；(3) 毒品犯罪部分，移工絕多數是購買毒品而非販售或製造毒品，而且不少移工是在生活適應上出現問題後，才在同鄉、雇主、仲介的引誘下接觸毒品；他 / 她們本身也是受害者，惡性並不重大。

事實上，來自特定東南國國家的移工並沒有比較容易犯罪，她 / 他們雖然也會因為各種因素而違反台灣法律，但相較於台灣本地勞工犯罪的機率，⁶⁷ 東南亞移工的犯罪率和造成的社會秩序衝擊並沒有比較高。其次，民眾有時會誤解或僅片面分析官方的統計資料。舉例來說，2018 年台灣曾發生過一起加拿大籍男子遭分屍的命案，⁶⁸ 警方破案後發現犯罪行為人有雙重國籍的白人、美國籍的黑人，以及台灣籍的男子，但當時媒體和網路上對此重大刑案的討論或分享較多是集中在「外國人犯罪」，而沒有釐清是哪裡的外國人，也沒有對台灣人作為參與犯的部分進行檢討。此種情況是直覺式地將外國人與犯罪劃上等號，然後再默默地將

⁶⁶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情統計通報》，第 241 號（2017 年 12 月 19 日）。

⁶⁷ 內政部警政署，《重要統計結果表（刑事案件嫌疑犯人數——按職業別）》，〈<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80146&ctNode=12902&mp=1>〉（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⁶⁸ 〈永和分屍案警方預防性境管 6 人 初步排除涉案〉，《自由時報》，2018 年 8 月 24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530337>〉（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犯罪與本國人脫鉤。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台灣的新聞媒體轉述警方資料，表示在 2018 年 1 月至 7 月所破獲的 2,051 件外籍人士在台刑事案件中，以越南籍的跨國移工犯案最多，其次是泰國，而且比 2017 年同期有所增加。⁶⁹這樣的內容容易誤導一般台灣民眾，使其產生越南籍移工很容易成為罪犯的認知。事實上，越南籍移工的犯罪率較高與其在台的人口總數相關；詳言之，來台的東南亞移工人數中以印尼、越南、泰國及菲律賓等四個國家為大宗，而從事營造業與製造業的跨國移工中有 40% 以上是越南籍。如果我們不進一步對有關移工犯罪率的統計資料進行分析與探究，而是以直觀的統計數字輕率斷言越南籍移工犯案最多或最容易犯罪，是既不正確又扭曲事實的理解。最後，我們應該意識到犯罪也是一種個體的理性選擇；誠如本文一開始提及的，扣除掉偷渡與人口販運等情況，來台從事物理勞動力型工作的東南亞移工是為了「求財」，而不是為了被起訴和判刑服役而來。因此，除非是有一些特別的因素致使其甘冒被通緝、受審、入監或遣返一類的風險，否則跨國移工並無誘因去從事犯罪行為。

透過以上的分析，本文認為跨國移工來到台灣後雖然有一定比例的人數會犯罪，但其對我國社會秩序造成的衝擊或危害相較於本國人，並沒有比較大。真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移工在上班期間與雇主或台灣本地勞工，或是下班後與台灣民間社會在互動和相處上的一些磨擦，特別是因為文化與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所導致的衝突。姜綿齊曾透過問卷對 287 位在台灣的印尼、越南、泰

⁶⁹ 〈外籍人士在台犯罪逐年增加 移工占 6 成 5 最高〉，《中時電子報》，2018 年 9 月 5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904004433-260402?chdtv>〉（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國、菲律賓移工進行分析，發現宗教信仰這項變數對於跨國移工在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影響。⁷⁰不過，台灣是一個宗教文化非常多元與開放的社會，雖然境內沒有像印尼那麼多的穆斯林人口，也沒有像菲律賓那麼高比例的天主教徒，但對於這些公開在穿著上表達自己信仰或展現自己宗教認同的移工，台灣人至少在客觀行為上沒有對之加以排斥。特定東南亞國籍的移工群體真正在台灣面臨之挑戰是民間社會在主觀認知上的偏見。詳言之，很多人在路上看到膚色黝黑的移工會下意識的避開；比起相對熟悉的美西法德日韓等國的語言，台灣人對印越泰菲等國的語言容易產生心裡上的反感；生活教育上，不少父母會告誡孩子像台中火車站前的第一廣場沒事盡可能避免前往；搭乘區間車到了中壢，面對大量移工上下車的擁擠與喧嘩，形塑了不少通勤族對移工的鄙視；而臉書「靠北外勞」版上的許多對話更是直接反映部分台灣人在日常生活中對這群移工的刻板印象與敵意。⁷¹文獻上，有學者從種族外觀 (racial profiling) 的角度切入對歧視現象進行了分析，發現人類傾向將特定的外顯資訊與某些種族進行聯結，實例上不少警察在執勤時便依「種族外觀」對特定群體加強調查或臨檢，⁷²

⁷⁰ 姜綿齊，《台灣地區外籍勞工宗教傾向、衝突處理風格、適應情況之相關性研究－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之跨文化比較》（長榮大學國際企業所碩士論文，2011 年）。

⁷¹ 張雅鈞，〈別讓台灣因為移工議題成為第二個美國〉，《吐納商業評論》，2018 年 1 月，<<https://tuna.to/immigrant-b2d52ffcdbc6>>（2019 年 7 月 31 日查詢）。

⁷² 根據嚴謹的計量分析，黑人或膚色較深的人種被美國警方隨機攔下詢問或調查的機率遠高於白人，詳見：James Jones, "Killing Fields: Explaining Police Violence against Persons of Color," *Social Issues*, Vol. 73, No. 4 (December 2017), pp. 872-882.

類似的情形其實也頗常在台北火車站可見。學者藍佩嘉曾表示，台灣早年對於原住民的歧視與現在對於跨國移工的歧視有許多類似之處，例如被雇主控制或剝削、被主流群體視為野蠻或欠缺文化水平、扣留他／她們的證件或人身自由等。⁷³ 正是因為這些源自接收國本地人的歧視與偏見，導致跨國移工來到台灣後很難避免不在工作或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與我國人民產生磨擦或衝突。

三、小結

經由對台灣的個案進行觀察暨分析，本文發現雖然有不少台灣民眾認為我國境內的移工人數應該要減少，但官方政策上依舊是不斷放寬跨國移工（尤其是特定東南國國家的移工）來台工作的限制或相關條件，其背後的主要考量就是希望透過引入這些移工來滿足企業對勞動力之需求，同時維持國內的經濟成長，使台灣整體的經濟表現不受到勞動力短缺的羈絆。⁷⁴ 個案研究的結果顯示，跨國移工對台灣總體經濟面向的影響是正向的，而主要的受益者是缺工的企業或聘用這些移工的資方。但值得思考的是，此種正向的經濟效果是透過犧牲一些接收國本地較不具備競爭優勢的低階勞工作為代價。另一方面，在開放跨國移工來台的數十年中，政府與民間普遍忽略這個群體的屬人性質，而是將他／她

⁷³ 藍嘉佩，〈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關鍵評論》，2017年12月3日，〈<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7515>〉（2019年7月31日查詢）。

⁷⁴ Asia Pacific Migration Network, “New Southbound Policy Misses Migrant Worker Protections,” *ILO*, 〈<http://apmigration.ilo.org/news/new-southbound-policy-misses-migrant-worker-protections>〉(2019/07/31 查詢). 這篇報導值得台灣當局重視，除了點出我們借助移工來發展經濟，也指出政府在法律制度上未給予移工適度的保障。

們化約為輸出勞動力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對於移工在工作、生活、娛樂、社交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台灣社會比較不關心，甚至反而出現一些歧視或偏見，這些現象導致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在與台灣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持續產生障礙。⁷⁵ 事實上，本文的個案研究發現，跨國移工對台灣的社會秩序並未構成明顯的負面影響，同時在與本國人相比時，這些移工的犯罪率也沒有比較高。

肆、結論

台灣與許多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一樣，如要延續它的經濟發展就不能不引入跨國移工；同時也需要透過這些移工來累積人力資本。正因為如此，各國有關跨國移工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角度出發，聚焦在這樣的群體對於接收國經濟的影響或是勞動市場的衝擊。不可否認，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如果在薪資上具有競爭力時，就會對台灣本地的勞工產生排擠效應，使其要不面臨失業，要不得在工資上做出一定程度的犧牲。然而，這種因跨國移工而產生的經濟層面衝擊是非常有限且對象特定的；文獻上已經指出，較低教育水平的本地勞工才是排擠效應下的受害者，並且這種負面衝擊多半是在短期。換句話說，若以較長的觀察期來審視跨國移工對接收國經濟的影響，或是針對教育水平或技術質量較高的本地勞工來說，跨國移工並不會對接收國的經濟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此外，本文的個案分析顯示，台灣本地勞工的失業主因是

⁷⁵ 吳挺鋒，〈台灣外籍勞工的抵抗與適應：周休做為一個鬥爭場域〉，《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3 期（2002 年），頁 103-150；曾熾芬，〈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第 32 期（2004 年），頁 1-58。

薪資不如預期或工作地點不理想的「自願性棄職」。事實上，跨國移工所帶來的人力資本填補了接收國許多產業在生產力上的短缺，台灣就是一例，所以經濟發展能夠維持在一定水準。

不過，有關跨國移工對於接收國經濟的貢獻究竟實際上是什麼情形，目前還沒有定於一尊的通說見解或確切解答。過去的研究只是告訴我們這些移工對接收國是有經濟助益的，但這樣的助益多半是只侷限在某些群體，而不是接收國所有的國民。⁷⁶ 以我們台灣的例子來看，目前其實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來自特定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對於台灣本地勞工產生顯著的排擠效應，或者實際上明顯降低台灣本地勞工的薪資，這些問題或是更為細緻化的討論（例如哪一類型的勞工或哪一縣市的薪資水平）還有待學界進一步的研究來加以釐清。目前比較能夠確定的是，跨國移工對台灣企業在利潤的增加和勞動人事成本的降低具有助益，同時對政府而言，開放這些跨國移工來台可以補足勞動力上的缺口並發揮抑制產業外移之效果，這對穩定國家經濟幫助甚鉅。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社會或是多數民眾還沒有在主觀認知上想要完全接受跨國移工成為我們的一份子，這背後的原因頗為複雜，既有經濟因素，亦有社會因素，而本文的研究係針對利益分配失衡的面向提供了分析，指出雖然企業和政府受惠於跨國移工的引入，但過程中將移工所帶來的問題（成本）轉嫁給國內較為弱勢的低階勞工，使其面臨失業或薪資減少的風險。此外，移工在上班與日常生活中是直接與台灣本地人民相處互動，而較少與企業主或政府公務

⁷⁶ 類似的見解尚可參考：王宏仁、白朗潔，〈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設計：誰從台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5 期（2007 年 3 月），頁 35-66。

人員交集，這使得民間社會容易在文化差異、溝通困難或生活習慣分殊的情形下，與移工群體發生磨擦或衝突，最終在族群融合上產生困難。如果企業和政府仍然有需要持續引進跨國移工，那麼對上述這些問題就不能再加以漠視。事實上，以目前台灣境內的移工人口總數來看，這個群體已經（或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我國人口結構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所以政府在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之餘必須認真思考怎麼為這個群體進行規劃與安排，而不是僅僅放寬對這些移工來台的限制，滿足企業或雇主對於勞動力短缺的需求，但把許多移工帶來的問題不當轉嫁給民間社會去吸收。

從全球化的角度來思考，移工就是跨境人力資本的流動，有需求且有吸引力的國家才會讓移工有意願前往，如果這樣的國家越來越多，或是競爭物理勞動力型工作者的壓力越來越激烈，台灣是不是還可以成為有移工願意前來就業的接收國呢？本文認為，除非台灣能找到移工以外的其它方法填補目前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否則建立一個較目前更為完善且友善跨國移工的環境，是確保持續吸引移工來台工作的必要課題。當然，移工引入我國後的社會參與及生活適應問題也必須一併思考。鑑於台灣目前多數民眾對於來自東南亞的移工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視或偏見，政府應該設法導正國民認知，例如不再單純把這些東南亞移工視為勞動力輸出的「工具人」，或只是來台灣供給勞動力的暫時性存在，而應在政策上與教育上協助台灣人民接納移工與尊重移工，將這個群體視為我們融入全球化過程或是社會轉型的一部分。而具體的做法之一就是澄清跨國移工對台灣社會秩序並不會也沒有構成安全上的威脅；誠如本文在個案中的發現，跨國移工來到台灣後

雖然有一定比例的人數會犯罪，但其對我國社會秩序造成的衝擊或危害相較於本國人，其實並沒有比較高。而跨國移工的犯罪類型在統計上絕多數並非暴力犯罪（強盜、殺人、傷害等）或財產犯罪（勒索、詐欺、竊盜），故也沒有特別減損台灣社會的治安。鑑此，認為跨國移工犯罪率較高或是有礙台灣社會秩序的穩定是一種主觀上的認知不完全，帶有偏見或歧視。然而，除非台灣歧視移工的最終劇本是停止引入這些來自特定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否則的話，相較於將他／她們視為安全上的威脅，遠不如在制度上給予平等合理之對待，並協助其與台灣民間社會的互動正常化，才是更有利於我國長遠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之做法。

（收稿：2019年2月5日；第一次修正：4月3日；第二次修正：12月3日；接受：2019年12月23日）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一) 期刊論文

王宏仁、白朗潔，2007/3。〈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設計：誰從台越國際勞動力流動獲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5 期，頁 35-66。

江豐富，2006。〈外勞引進對本國勞工失業、職業選擇及薪資的影響〉，《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 37 期 1 卷，頁 69-111。

李健鴻，2017/6。〈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自然人移動」的勞動市場調控機制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9 卷 2 期，頁 284-285。

吳挺鋒，2002。〈台灣外籍勞工的抵抗與適應：周休做為一個鬥爭場域〉，《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3 期，頁 103-150。

林佳和，2005/11。〈高雄捷運泰勞暴動事件〉，《月旦法學雜誌》，第 126 期，頁 187-196。

周憐嫻，2002。〈白領犯罪的界定與爭議〉，《犯罪學期刊》，第 9 期，頁 1-32。

陳坤銘，2007/6。〈引進外籍勞工對台灣經濟影響之再分析〉，《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5 卷 1 期，頁 1-26。

張翰壁、張晉芬，2013。〈全球化效果的侷限：臺灣民眾對接納跨國移民的態度〉，《臺灣社會學刊》，第 52 卷，頁 131-167。

曾熾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第 32 期，頁 1-58。

楊婉瑩、張雅雯，2014/6。〈為什麼反對移工 / 移民？－利益衝突抑或文化排斥〉，《政治科學論叢》，第 60 期，頁 49。

蔡田木，2008。〈外籍人士在臺犯罪狀況及其在監生活之分析〉，《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第 9 期，頁 165-191。

（二）專書論文

李誠，2007。〈外勞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羅紀琮主編，《台灣外籍勞工研究》。台北：中央經濟研究院，2007 年，頁 9-43。

（三）學位論文

姜綿齊，2011。《台灣地區外籍勞工宗教傾向、衝突處理風格、適應情況之相關性研究－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之跨文化比較》。台南：長榮大學國際企業所碩士論文。

陳俊育，2011。《經濟成長與人口遷移：美國個案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碧珠，2011。《外國人在臺犯罪預測及防制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四）官方文件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12/19。《國情統計通報》，第 241 號。

（五）研究計畫

辛炳隆，2011。《主要經貿國家產業競爭研究及政策規劃計畫：

勞工法令及相關政策變革對我國產業的影響與因應》。台北：經濟部工業局。

致理技術學院，2012/8。《建立外籍勞工引進對國內整體經濟與社會效益之制度化評估》。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林國榮，2014/4。《未來十年我國外勞政策變革方向之研究》。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李宜，2009/11。《國際人口移動對我國勞動市場及經社發展之影響與因應對策》。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014/3。《外勞引進政策對國人就業之衝擊評估研究》。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傅仰止等人，2019/5。《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七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蔡青龍、林季平，2000。《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工作異動之影響分析》。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六）網際網路

中時電子報，2018/9/5。〈外籍人士在台犯罪逐年增加 移工占 6 成 5 最高〉，《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904004433-260402?chdtv>>（2019/07/31 查詢）。

經濟日報，2018/10/1。〈消失的中流砥柱 台灣勞動市場正式進入中高齡化〉，《經濟日報》，<<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396661>>（2019/07/31 查詢）。

自由時報，2009/12/26。〈藍領失業率破 7% 貧富差距擴大〉，《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12431>> (2019/07/31 查詢)。

內政部警政署，2019/7/25。〈重要統計結果表〉（刑事案件嫌犯人數—按職業別），《內政部警政署》，<<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80146&ctNode=12902&mp=1>> (2019/07/31 查詢)。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6/12/28。〈新南向政策參考資料〉，《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Content/upload/editor/otherfiles/1061011新南向政策參考資料.pdf>> (2019/07/31 查詢)。

張雅鈞，2018/1。〈別讓台灣因為移工議題成為第二個美國〉，《吐納商業評論》，<<https://tuna.to/immigrant-b2d52ffcdbc6>> (2019/07/31 查詢)。

勞動部。〈勞動部統計查詢網〉。《勞動部》，<<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100&kind=10&type=1&funid=q13021&rdm=o7fKZKio>> (2019/07/31 查詢)。

勞動部統計處。〈外籍工作者相關統計資料〉，《勞動部》，<<https://statdb.mol.gov.tw/html/mon/i0120020620.htm>> (2019/07/31 查詢)。

彭政添，2019/4/5。〈淺談統計數字中的東南亞移工現況〉，《移人》，<<https://mpark.news/2019/04/05/5738/>> (2019/07/31 查詢)。

- 藍嘉佩，2017/12/3。〈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7515>>
(2019/07/31 查詢)。
- 鄭國強，2015/5/12。〈高齡、少子化 勞工每年短少 25 萬〉，《台
灣醒報電子報》，<<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512-L54X>>
(2019/07/31 查詢)。
- 薛承泰、林昭禎，2004。〈外勞數量與台灣勞工就業的關係〉，《國
家政策論壇》，<<http://old.npf.org.tw/monthly/0401/theme-212.htm>> (2019/07/31 查詢)。
- 爛非渝，2018/1/3。〈同工不同酬、非理性崇洋，台灣成為「弱勢
西方人」的海外最佳「避風港」？〉，《換日線》，<<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894&nid=9202>>
(2019/07/31 查詢)。

二、英文部分

(一) 期刊論文

- Adamson, Fiona, 2016. "Crossing Bord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pp. 165-199.
- Alba, Richard, 2005. "Bright vs. Blurred Boundaries: Second-Generation Assimilation and Exclusion 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8, No. 1, pp. 20-49.
- Arifianto, Alexander, 2009. "The Securit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Malaysia and Indonesia,"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1, No. 4, pp. 613-630.

Auerbach, Alan and Philip Oreopoulos, 1999. "Analyzing the Fiscal Impact of U.S. Im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2, pp. 176-180.

Blau, Judith and Peter Blau, 1982. "The Cost of Inequality: Metropolitan Structure and Violent Cr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7, No. 1, pp. 114-129.

Blumer, Herbert, 1958. "Race Prejudice as a Sense of Group Position,"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 No. 1, pp. 3-7.

Boersma, Maren, 2019.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Between Permanence and Temporariness in Everyday Life," *Current Sociology*, Vol. 67, No. 2, pp. 273-293.

Borjas, George, 2003.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4, pp. 1335-1374.

Bretschger, Lucas, 2001. "Labor Supply, "Migration,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pen Economies Review*, Vol. 12, No. 1, pp. 5-27.

Buonanno, Paolo and Daniel Montolio, 2008. "Identifying the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Crime across Spanish Provinc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8, No. 2, pp. 89-97.

Card, David, 2005. "Is the New Immigration Really so Bad?" *Economic Journal*, Vol. 115, No. 507, pp. F300-F323.

Carrasco, Raquel, Juan Jimeno, and A. Carolina Orteg, 2008.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of

- Native-born Workers: Some Evidence for Spai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1, No. 3, pp. 627-648.
- Chetail, Vincent, 2018.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s in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From Minimum Standards to Fundamental Rights,”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Vol. 28, No. 1, pp. 225-255.
- Choucrist, Nazli, 2002. “Migration and Security: Some Key Linka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6, No. 1, pp. 97-122.
- Churchill, Sefa and Emmanuel Laryea, 2019. “Crime and Ethnic Diversity: Cross-Country Evidence,” *Crime & Delinquency*, Vol. 65, No. 2, pp. 239-269.
- Dolado, Juan, Alessandra Goria and Andrea Ichino, 1994. “Im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the Host Country: Evidence from Pooled Country Dat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7, pp. 193-215.
- Edo, Anthony, 2019.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Vol. 33, No. 3, pp. 922-948.
- Ehrlich, Isaac, and Jinyoung Kim, 2015. “Immigrati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Human Capital*, Vol. 9, No. 4, pp. 518-563.
- Foner, Nancy and Richard Alba, 2008. “Immigrant Religion in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Bridge or Barrier to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2, No. 2, pp. 360-392.
- Glomm, Gerhard and B. Ravikumar, 1992. “Public Versus Private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Endogenous Growth and In-

- 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No. 4, pp. 818-834.
- Hansen, Jorgen and Magnus Lofstrom, 2003. “Immigrant Assimilation and Welfare Participation: Do Immigrants Assimilate into or out of Welfar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 38, No. 1, pp. 74-98.
- Hewison, Kevin, 2004.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4, No. 3, pp. 318-335.
- Jones, James, 2017. “Killing Fields: Explaining Police Violence against Persons of Color,” *Social Issues*, Vol. 73, No. 4, pp. 872-882.
- Kaushal, Neeraj, Robert Kaestner and Cordelia Reimers, 2007.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September 11th on Arab and Muslim 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 42, No. 2, pp. 275-308.
- Kendrick, John, 1994. “Tot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tlantic Economic Review*, Vol. 69, pp. 396-410.
- Mankiw, N. Gregory, David Romer and David Weil, 1992.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pp. 407-437.
- Mears, Daniel, 2002. “Immigration and Crime: What’s the Connection?” *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 Vol. 14, No. 5, pp. 284-288.
- Mosley, Layna and David Singer, 2015. “Migration,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8, No. 1, pp. 283-301.
- Ottaviano, Gianmarco and Giovanni Peri, 2012. “Rethinking the

-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0, No. 1, pp. 152-197.
- Peri, Giovanni, 2016. “Immigrants, Productivity, and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30, No. 4, pp. 3-30.
- Solow, Robert,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No. 1, pp. 65-94.
- Tsay, Ching-Lung and Ji-Ping Lin, 2001. “Labor Importation and Unemployment of Local Workers in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10, No. 3/4, pp. 505-534.
- Weiner, Myron, 1992/93. “Security,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pp. 91-126.

(二) 專書

- Benjamin, Dwayne and Michael Baker, 1992. *The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in the Canadian Labor Market*. Mimeo: University of Toronto.
- Berger, Ronald, 2011. *White-Collar Crime: The Abuse of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Power*.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ILO, 2018.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2nd Ed.* Geneva: ILO.
- Peters, Margaret, 2017. *Trading Barriers: Im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u, Helen, Richard Wong and David Faure, 2005. *Rethinking Hong Kong's Human Resources and Competitiveness: A Pre-Policy*

Stud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nry, Michael, 1997. *Ethnicity, Crime, and Immigration: Comparative and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三) 專書論文

Bauer, John, 2001.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in East Asia," in Andrew Mason, eds.,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3-59.

Braithwaite, John, 1992. "Poverty, Power, and White-collar Crime," in K. Schlegel and D. Weisburd, eds., *White-Collar Crime Reconsidered*.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78-107.

Chan, Johannes , 2004. "The Evolution of Immigration Law and Policies: 1842-2003 and Beyond," in Johannes Chan and Bart Rwezaura, eds., *Immigration Law in Hong Kong: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Hong Kong: Sweet & Maxwell Asia. pp. 1-58.

Cornell, Stephen and Douglas Hartmann, 2004. "Conceptual Confusions and Divides: Race, Ethnicity, and the Study of Immigration," in Nancy Foner and George Fredrickson, ed., *Not Just Black and Whit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23-40.

Lynch, James and Rita Simon, 2007.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Criminal Involvement among Immigrants and Natives across Seven Nations," in Graeme Newman and Joshua Freil-

ich, eds., *Crime and Immigration*. Burlington: Ashgate. pp. 273-290.

(四) 網際網路

Asia Pacific Migration Network, *New Southbound Policy Misses Migrant Worker Protections*, available on: <<http://apmigration.ilo.org/news/new-southbound-policy-misses-migrant-worker-protections>>.

Borjas, George, 2013. "Immigration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https://sites.hks.harvard.edu/fs/gborjas/publications/popular/CIS2013.pdf>>.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9/5/16. *Labor Forc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born Workers Summary*, available on: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forbrn.nr0.htm/labor-force-characteristics-of-foreign-born-workers-summary>>.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2016/9/21.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tudy of Immigration: Workers and Taxpayers Lose, Businesses Benefit*, available on: <<https://cis.org/Press-Release/National-Academy-Sciences-Study-Immigration-Workers-and-Taxpayers-Lose-Businesses>>.

Jaumotte, Florence, Ksenia Koloskova and Sweta Chaman Saxena, 2016/10/24. "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come Levels in Advanced Economies," *Spillover Notes*, No. 16/0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pillover-Notes/Issues/2016/12/31/Impact-of-Migration-on-Income-Levels-in-Advanced-Economies-44343>>.

Jennings, Ralph, 2013/4/29. "Southeast Asian Migrants Revitalizing Taiwan Economy," VOA News, <<https://www.voanews.com/a/southeast-asian-migrants-revitalizing-taiwan-economy/1650818.html>>.

Koekkoek, Marieke, 2014/2.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GATS Mode 4 Negotiations of the Movement of Low Skilled Workers,"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https://ghum.kuleuven.be/ggs/publications/working_papers/2014/131koekkoek>.